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

(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浙江革命史料 特 辑

(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0年8月

浙江革命史料特辑（三）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
（内部发行）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50,000

1980年8月第一版

1980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统一书号：11103.44

定 价：0.63元

目 录

沙文求烈士传略	史 永 (1)
汪子望烈士事略	潘念之 (10)
董子兴同志狱中日记	戚秀媛供稿 (14)
裘古怀烈士遗书二封	(22)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	
——记“四·一二”以后的宁波	周闪耀 (24)
奉化暴动	陈修良 (29)
记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龙 跃 (32)
浙南岗头村革命简史	曾成文 (41)
忆林夫兼记浙南往事	连 珍 (45)
我在江南、浙江工作接触到的	
陈毅同志	何克希 (54)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涉外事件	顾春林 (66)
定海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简述	陈子方等 (77)
东方小学	周丕振 (97)

抗日战争在余上（中）……………张 光（109）

一九四〇年嵊县党组织情况及

“六·三”斗争 ……………杨源时（127）

过河不忘搭桥人

——回忆上虞爱国民主人士

杜婉容女士二、三事……………金乃坚（147）

余上特派员制的建立及其他 ……寿静涛（152）

我在海上工委一段回忆 ……………洪舒江（156）

为炊事员祝寿 ……………楼春阳（164）

四明青山埋忠骨

——忆黄 明烈士……………张 明（170）

强攻泰顺城 巧歼增援敌 ……………蔡存辉（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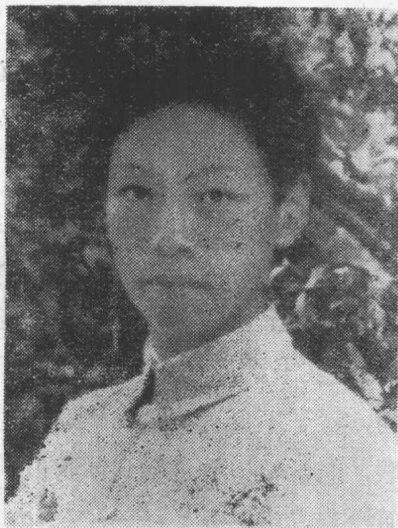
从鸡鸣社到金肖报

——解放战争时期路西地区

敌后宣传工作回忆 ……………杨 光（193）

沙文求烈士传略

史 永



沙文求烈士遗像

沙文求同志，浙江省鄞县大咸乡沙村（今属塘溪公社）人，一九〇四年生。一九一一年入本村小学读书，当时家境已经破落，生活不好，曾停学两年，在乡从事农业劳动。一九一九年因其兄已有薪入，得以复学。曾于宁波效实中学、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等校就读。一九二五年春进入我党办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秋，转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是年冬，在宁波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初，受党委派回故乡组织农民运动。同年秋，赴广州入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任该校共青团书记。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后，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广州起义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兼少年先锋队总队长，旋改任赤卫队队长，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八月被捕，牺牲于广州，时年二十四岁。

(一)

文求同志少年时代，勤奋好学，喜看历史书籍和古典小说，景仰民间英雄任侠行为，又见乡间恶霸横行，欺凌弱小，他非常愤恨，逐渐孕育出一种刚强果敢，见义勇为纯朴的农民性格。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文求同志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亲眼见到贫苦农民终年劳动果实都交给了地主，而自己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同时他联想到国势日衰，中国人民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侮辱，他将这一切都记在心头，立志发奋求学，为国效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致力于功课之外，还抽出余暇，练习拳击和阅览兵家之书，并与有志气的青年，结为知己。他也想过：要想振兴中国，单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个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团体，才能在社会上发挥作用。自从“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勃兴，各种外文书籍，不断地在中国翻译和出版，文求同志在效实中学期间，看了不少有关新文化运动的书籍。他向往着革命成功后的苏联，时常希望有机会到苏联去学习，他曾几次找关系想到苏联去而没有成功。

当时，宁波效实中学是当地最保守的学校，文求同志在新思想的感染下，积极起来反对该校当局的封建的教育方针和各种不合理的措施。他认为这个学校就是“孔家店”，但是他在那时还仅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在行动上更多地属于自发行为。如某次曾因反对一个不学无术、贻误学业的理化教师，而掀起罢课的风潮。他领导二年级的学生全体离校，并在外借住自修，要求将这位教师解聘，不达目的决不回校上课。文求同志是

这次风潮的发动者，学校已决定将他开除学籍，但由于二年级同学行动一致和校董之间的矛盾，结果以调换教员而取得胜利。一九二三年上海大学开办了，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开办的一所大学，瞿秋白同志又是社会系主任。文求同志在上海国语师范补习学校补习了一个时期之后，于一九二五年考入了上海大学就读于社会系。在这个学校里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工人、学生和全市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激起了全国性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枪杀我国工人顾正红开始的伟大的“五卅”运动，文求同志参加了当时有名的上海南京路的游行示威，在英帝国主义者屠杀的枪声之下，文求同志随着工人、学生的队伍边游行边喊反帝爱国的口号，以后积极地投入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革命浪潮中去。他参加了游行后，兴奋地写信给他的弟弟说：“我在游行喊口号时，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群众的革命爱国热情实在令人太兴奋了。”另一方面，他也亲眼看见帝国主义者疯狂地开枪扫射游行群众，并逮捕工人和学生，事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布满了上海，一切呈现战时状态，在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相互勾结下，上海大学也被查封了，还下令通缉瞿秋白等同志。学校被查封后，为了保卫学校，文求同志和部份同学依然勇敢地留在学校里，坚持斗争和准备作其他新的活动。后来帝国主义者派出海军陆战队进占学校，并驱逐留校的学生，这时文求同志才离开了被陆战队占领的学校。通过“五卅”运动的斗争，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大大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觉悟；同时，认识了我国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他在宁波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

一九二五年以来,大革命的风潮磅礴全国。一九二六年初,文求同志接受了党的指示,回到自己故乡去进行农民运动。当时,江浙一带的商人、地主、豪绅等的反动势力相当雄厚。文求同志回到故乡后,为了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排除一切困难,大力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并先把村里的一些贫农秘密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核心力量,进行秘密活动。初时,有些农民长期受着封建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还未深切体会到农会是自己的组织,不敢立刻加入农会。到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参加农会的仅有十几人。为了使农民们相信农会的确是贫苦农民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的组织,文求同志找寻一切机会进行工作。一天,村里有个农民误砍了界边别人的树木,恶霸沙听涛乘机敲诈勒索,这位农民没有钱,不能遂其所欲,沙听涛即勾结山地主人,把这个农民捆绑起来,硬说他是盗窃犯,声言要送官府处理,妄图压倒农民的活动。文求同志针对这一事件,领导农民进行反霸斗争,这次斗争孤立了恶霸沙听涛的势力,沙听涛数月不敢出门。农会的威信从此大大提高了。文求同志乘机公开吸收会员,农民明白了组织农会的意义后,纷纷加入农会,会员人数立即激增。农民的势力壮大了,便正式公布成立沙村农民协会。

沙村农会成立后,沙村和邻村的土豪、劣绅、地主把它看作眼中钉,便造谣污蔑,胡说农会是“坏人”、“懒汉”的组织,将来政府必然会来解散逮捕。一些觉悟尚未提高的农民,听了种种威胁和谣言又犹豫起来了。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文求同志召

集了会员共同商议，号召并亲自同农民会员一起从事义务劳动，修理道路与公共水利，组织贫困农民在公山上砍柴，以提高收入等等。又在村里办起一所农民业余夜校，帮助农民进行文化学习和政治学习，一时村里游手好闲和赌博等现象消失了，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农会的组织，也提高了农会的威信。

与此同时，乡间发生了饥荒，米珠薪桂。距离沙村二公里的圪头街（是当地一个重要的集市）的米商，唯利是图，不顾贫苦人民的死活，规定米市不设零售（一斗以下不售），贫苦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农会为了解决农民们的生活问题，立刻在沙村召开农会会员大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由文求同志率领众人，各人带备一升数合的米款，赶往米市。农会会员有计划地插入买米的群众中去，逼使米商作一升数合的零售。由于农会这一措施，适合广大贫苦人民的要求，在群众公愤下，米商只得依照农会提出的条件，撤销了唯利是图的规定，实行零售。沙村农会斗争的胜利，使远近各村的贫苦农民都感到加入农会的好处，纷纷要求组织农会和加入农会。

同年五月，乡中又发生菸酒税征收额外强征的事件（该地农民的习惯，普通农民都酿少量的米酒），在文求同志领导下，农会为了维护贫苦人民的利益，发动农会会员起来与征收员作不调和的斗争，到处贴标语，作宣传，使征收员以后也不敢来沙村收税了。附近各村农民也藉此得以免征额外的酒税。

由于文求同志能根据党宁波地委发展农民运动的方针，处处为农民的利益着想，又经过反霸、反奸商等一系列的斗争，农民协会在沙村既是群众组织又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在此基础上，文求同志先后吸收了五、六个贫农入党，建立了一个党支部，他担

任了这个支部的书记。一九二六年七月，文求同志调离沙村，这时农会的会员已增至八、九十人，沙村农会的威信也散播到周围各个农村里。一九二六年秋起，这里的农会工作改由沙文汉同志继续领导，后来与浙江省有名的农民运动领导人卓兰芳同志在奉化松岙所组织的农民协会南北相连，在象山港沿岸的奉化、鄞县地区成为农民运动的根据地，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连续进行武装斗争。

(三)

文求同志离开故乡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党和团号召各地青年前往广东支援。文求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从上海赶往广州，并考入了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哲学系，任该校共青团支部书记。那时，文求同志马列主义的政治水平已经相当成熟，如他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前写给他的大哥沙孟海同志的信中说：“中国革命的局势已经一变而转入新时代”，指出国民党将叛变革命，它们“是要消灭孙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要拉着中国社会到封建政治——军事独裁底路上去”，并指出今后中国革命将“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三大势力共同建设农工的民主制度底新时代”。（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五辑《沙文求烈士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七封书信》第七——八页）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卖国集团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党受到重大的损失，幸存者都转入了地下。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奋不顾身地工作着，

忘记了疲劳和危险。当时他的哥哥鉴于形势险恶，屡屡劝他回上海。他接信后，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你来信叫我不要做太危险的事情，我想你不必这样说，对于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你是很有损失，因为这就表示了你的不果断。……你对于诸弟，尤其对于我应该是促其入险，鼓其前进，姑无论你自己能否临阵，但须知你的弟我能临阵，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临阵而胜，非我之胜，亦你之胜。你是督促临阵者，我是临阵者，事实应该如此，你切不要染溺爱之气，而表示中馁之状态。”（见上引《选辑》第一四页）。由此可见，文求同志在革命困难时期，革命的意志是坚强的，不愧为无产阶级英勇的战士，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

文求同志对革命前途也充满着信心，虽然大革命的成果被反动派所篡夺了，但他认为“由于这里（指广东）的农村运动已有很长的历史，乡间的革命势力已有很好的基础，如同湖南、湖北一样”（见上引《选辑》第十一页），已经看到农村根据地的曙光了，所以他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见上引第十四页）。即革命的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这些信念鼓舞着文求同志更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七年九月，文求同志的行踪已为敌人所发觉，国民党警察侦察到党的交通机关，警察潜伏在交通机关里等候他回来。当文求同志走向交通机关时，一个邻家的老婆婆知道情况有点不妙，叫他避开不要进去，可惜他对广州方言听不懂，仍若无其事地进入屋子里去，结果被捕。由于文求同志自少练得一手拳艺，把拉住他的一个警察打倒，立即跑进中山大学（在惠爱路）并从后门逃走，警察起来追问站在门口的老太婆：“那人逃到那里去

了？”这位老婆婆故意指向另一条路，文求同志得以脱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清晨，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爆发了，红旗布满了广州，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文求同志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和少年先锋队总队长，领导少先队员维持市内秩序，开展宣传活动并参加肃反工作。当时中山大学的反革命分子和广州法院的法官，就是他带领着这班少年先锋队同志前往逮捕的。

广州起义的第三天，由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互相勾结进行镇压，广州起义失败了。那时文求同志已担任赤卫队的队长，他率领赤卫队员与敌人展开浴血苦战，但因寡不敌众，后路被切断，他同几个同志冲出重围，机警地走入一所马车房子里躲过了敌人的追击。十二月十八日他向其兄报平安的信中说：“此次广州经过共党之乱（他在信中照国民党报纸的口气称广州起义），牺牲真是不小，……被杀戮者据报上所记，单属共党本身已逾二千人之多。古人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则谁为之天？谁为之地？是固有人在也！我想为之天、为之地者，不特对于此次惨劫无动于心，且将更进而为天之日、地之地以照临斯民耳！……昨晚七、八时，出街闲步，街上已少人迹。朔风夜至，卷沙扬尘，当空怒号。疑为已死者呼冤叹伤，而动未死者之怀也”。（见上引《选辑》第十八页）

起义失败后，组织上通知各人自找隐蔽，他与若干同志潜往香港，到港才几天，文求同志接到组织上的信，派他担任中共广州市委秘书长。经过起义失败后的广州，国民党反革命统治的残酷和党内情况的复杂性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何况文求同志的共产党员的身份已经几次暴露，非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是不敢受命的。这时文求同志的决心可以从他在一九二八年五月给他的兄弟沙文汉同志的信中看出来。他以勉励的口气表达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体会，即一、要有“雄大的胆量”，即革命的英雄气魄；二、光有胆量还不能干革命工作，“应更求技术之精良，贯彻和增进原有的胆量”，即要研究在起义失败后的条件下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三、“更要求知识之充实”，还应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到手。他认为有此三项，就能把革命工作做好。他告诫沙文汉同志说：这是根据“这里最近有些事情，使我不能不对你说的”，即从他在起义失败以后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见上引《选辑》第二〇页）。由于这封信是邮寄的，他不得不用“胆量”、“技术”、“知识”等名词笼统地表达出来，向沙文汉同志叙述自己在“生平的悲愤，责任的严重和事情的艰难”中的一些体会，并叫沙文汉同志“切不要把我的话平淡看过”（见同上引文）。

由于敌人不断地侦察和搜捕，不幸的日子终于降临了。一九二八年八月，沙孟海同志从上海邮汇几十元钱给他，款寄给“广州大新街元锡巷十四号”，不久邮局将款退回，注明“此屋已查封”，没人收款。经沙文汉同志通过党组织询问，一星期后党中央派同志回答：“沙文求同志已在广州被捕牺牲”。当时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加上“共匪”的罪名，报道沙文求同志牺牲的消息。

一九六三年五月写

一九八〇年二月校

汪子望烈士事略

潘念之

先烈汪子望原名懋钧，浙江龙游人，生于一九〇〇年间。初在龙游造纸厂工作，一九二二年到宁波，任鄞县云龙碶小学教员。一九二三年浙江进步教育家、国民党左派人士经子渊（亭颐）任浙江第四中学（设在宁波）校长，烈士受聘任该校初中部语文教师兼教务员。一九二五年经子渊去职，烈士离宁波到汉口，任宁波旅汉公学教员。

汪子望烈士幼年受的是封建教育，经五四运动，思想上、政治上转变很大，参加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军阀、官僚、绅士统治中国的黑暗势力，抨击甚力。继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正道。但他亦因此而受到顽固派的威胁、打击，几次失业，流转各地。

一九二三年初，汪子望烈士在宁波加入当时的进步青年组织“雪花社”，这年年底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当时宁波党的刊物《火曜》的编辑人之一，对该刊的撰稿及出版工作，尽力很多。

一九二四年冬，全国掀起“反基督教大同盟”运动，宁波响应这个号召，除了发行宣传特刊，向各方面展开活动以外，并于这年十二月廿五日（圣诞节）举行全市示威大会和游行，在各教

会学校学生间燃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烈火，进行了很大的斗争。因愤于帝国主义者的强暴压力，圣模女子中学及其他学校的许多教师、学生退出了学校。宁波党为支持这部分反帝师生的斗争和学习，一九二五年初创办了宁波启明女子中学。这个学校就是后来宁波革命运动的主要力量和基地。当时汪子望烈士积极参加了反基督教运动及创办启明女中的工作，并在启明女中创办初期，义务任课。

国家主义者当时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敌人，他们提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就是针对和企图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宁波国家主义派李瑄卿、陈杏荪、陈叔谅等人，披着爱国的伪装、欺骗群众，混入党领导的“五卅运动”，企图夺取宁波的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当时的第四中学初中部主任就是李瑄卿，李和他的几个亲信在同学间散布反共言论，曾经起了一些作用。烈士联络进步同学，对李瑄卿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揭发曾琦、李璜等的“醒狮派”和李瑄卿的所谓“新国家主义”的骗人谬论和反动实质，阐明共产主义的反帝、反封建运动的真义，工作颇为艰苦。但经过一场斗争，第四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提高了，看清了国家主义派爱国是假，勾结反动势力图谋私利是实。于是宁波五卅反帝运动的群众，都接受了共产党的口号和主张。有一次，参加游行的第四中学学生陈洪正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李瑄卿听了跑过去对他说：“你喊打倒帝国主义，老百姓听不懂，还是喊打倒列强的好。”陈洪回答说：“我要喊得老百姓都懂，都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李瑄卿企图夺取五卅运动领导权，篡改运动性质的阴谋，终于失败了。

汪子望烈士在群众运动中既坚持党的路线和纲领，其语言、文章又极生动活泼而富于感情，是党的一个好宣传员。

汪子望烈士在一九二五年夏间到汉口以后，仍积极参加党的各项工作。一九二六年秋，北伐军到达武汉，党的工作大大展开了，烈士投身于工会组织及教育工作，特别在汉阳兵工厂内费了他的心力。但他在社会上仍保持宁波旅汉公学教员的身份，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一九二七年七月，国民党内的无耻政客汪精卫、孙科等人终于撕破“左派”的假面具，与蒋介石合流反共，凶恶地镇压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党的部分同志转移到外地去搞武装斗争，留在武汉的同志则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汪子望烈士因极少暴露，奉上级组织决定，留汉口负责党的一部分工作。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党的机关屡被破坏，不少同志牺牲了，尤其是在“左”倾机会主义影响下的一九二八年“春节暴动”后，党损失很大，于是烈士担负起更艰巨的工作。他以其原任职的宁波旅汉公学为联络地点，集合同志，恢复武汉地区的党组织，重新开始工作。后因被叛徒出卖，烈士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被反动派逮捕了。同时被捕的有旅汉公学教工三人。在狱中，他勉励同志们坚持斗争，绝不屈服，同时要以公开职业和社会关系掩护自己，不要招认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组织关系，求能出狱，继续为党工作。但烈士本人因被叛徒指证，并有其他被破坏机关的文件牵连，自知不能免，就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这一机关的唯一负责人，而被判死刑。四月五日早晨，汪子望烈士慷慨就义。同时牺牲的还有许伯平烈士。此外被捕的庞来清同志及工友一人则以烈士的掩蔽，在后得以释放出狱。

汪子望烈士未结婚，在汉口无亲属，被害后其遗体由旅汉公